

## 清华简《治邦之道》《治政之道》研读札记(三则)

芦娜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

DOI:10.12238/jief.v3i1.3602

**[摘要]** 清华简(捌)《治邦之道》的公布引起了学界对于该篇文献的广泛探讨,随着清华简(玖)《治政之道》的公布,为该篇文献的讨论提供了新的维度。简文中出现的“道”与“器”等关键性字眼对于简文的整体理解十分重要,且简文中所涉及的士人理想的“文德教化”对于士阶层的流动变化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 “道”; 士阶层变化; 仁政

**中图分类号:** G5 **文献标识码:** A

Three Reading Notes on *Zhi Bang Zhi Dao* and *Zhi Zheng Zhi Dao* of Tsinghua Bamboo Slips

Na Lu

Qilu 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ublication of *Zhi Bang Zhi Dao* by Tsinghua Jian has aroused extensive discussion in the academic circle.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Zhi Zheng Zhi Dao*, a new dimension has been provided for the discussion of this literature. The key words such as "Tao" and "Qi" in the text are very important for the overall understanding, and the ideal "Literary Moral Education" has a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flow and change of the class.

**[Key words]** Dao; class change; benevolent governance

## 前言

近来,大地献宝,一大批简帛文献的出土以及整理公布为我们更加全面的理解西周提供了契机。根据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相关人员的检测,初步断定清华简的年代为战国中期偏晚的年代。清华简(八)(九)两册的逐年公布,《治邦之道》《治政之道》两篇文献的思想内涵、竹简编联情况及有关文本动态形成的相关问题引起了学界广泛的讨论,不少研究者陆续发表高见。细加研读之余,略有些许思绪,谨以求教于师友。

## 1 “道”与“器”,“度”与“礼”

清华简《治邦之道》中多处出现了“道”的字眼,如“昔者寿(前)帝之(治)正(政)之道”<sup>①</sup>“上不爲上之道”<sup>②</sup>“皮(彼)唯(雖)先不道,我猷(猶)(一)”<sup>③</sup>“危身述(墜)邦之道”<sup>④</sup>。粗览可得,“道”的本意根据《说文解字》可引申

为道理<sup>⑤</sup>,即治理国家的通行法则之意。但令人较为困惑的是在简文中同样出现了“器”的字眼,如“或(國)必又(有)元(其)(器),少(小)大(守)之”<sup>⑥</sup>。《治政之道》中并没有对“道”与“器”的具体使用语境进行详细描述,这对于我们探究二者所使用的语境有一定困难。根据简文整理者<sup>⑦</sup>及李守奎<sup>⑧</sup>先生的观点,《治政之道》与《治邦之道》两篇简文根据简背划痕、竹简形制以及书手的写作风格等因素,二者可缀合以进行进一步的理解,这为我们理解二者的具体使用语境添加了新的文本分析材料。

在《治邦之道》中,“道”的出现频率为6次,“器”仅1次。但在《治政之道》中,作者阐释了“器”的用语环境,即“君守器,卿大夫守政,士守教,工守巧,贾守鬻聚鬻货,农守稼穡,此之曰攸(修)”<sup>⑨</sup>。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作为君主要守“器”,卿大夫要守“政”,士要守教化,以工艺

谋生的人要纯熟自己的技巧,商人们要以贩卖货物为“道”,农民们要扎根于土地,不同身份的人各自在自己所属的范围内,这便叫做“修”。由此可见,“修”是一种社会中每个阶层都在相应位置上的一种形而上的状态。这点还可参见《治政之道》开篇便提到的“昔者寿(前)帝之(治)正(政)之道,(上下)各又(有)元(其)攸(修)”<sup>⑩</sup>所以,“道”的用语环境很可能与“修”相对应,是一种形而上的用语环境。而“器”的用语语境可能是一种形而下的状态。“器”具体化便与“政”“巧”等概念相对。《周易·系辞上》中有关于“器”“道”的记载,“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sup>⑪</sup>,再联系《天下之道》中所记载的“道”与“器”的文本阐释,“道”的用语环境是没有参照物的,它是独立的;而“器”的用语环境是有一定情景性的,它是相对的。如“器”是可以被具体化为攻,守之

器,而“道”根据上下文对比,是没有具体化的。这一对概念正如任继愈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中对于道给出的解释:“‘道’具有‘有’和‘无’两种性质……‘道’虽不具有具体事物的形象,但它是构成一切有形有像的东西的基础,因此它原来就包含着形成各种各样的有形有像的东西的可能性。”<sup>①</sup>任先生的这段话为我们理解“道”与“器”的关系提供了思路,简文中的“道”可以理解为是具有“无”性质属性,而“器”是具有“有”性质属性。总的来看,“道”与“器”二者所指涉的最高范围是一致的,只是由于具体用语环境的差别而略有区分。

另外一对需要厘清区别的是“度”与“礼”。清华简(捌)中许多文章都体现了“度”的重要性,《治邦之道》中“(废)(兴)之不戾(度),古(故)(祸)福不远,(尽)自身出”<sup>②</sup>便是一个例子。该句的文意是说国家兴盛或衰落的关键在于“度”的存在,如果“度”不存在,祸事可能常在。在传世文献中,《论语》中“礼”一般被视为祸福的警戒线。在《论语·学而》中便有例证:“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sup>③</sup>这句话便谈到了礼的作用是巧妙地处理各项事情,先王治理国家的奥秘便在于无论事情的难易,都处理的十分合适。即使在治理时遇到困难,也要为恰当而求恰当。所以,通过一定的规矩制度加以约束,是有必要的。在《论语·里仁》篇中也有相应的记载:“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sup>④</sup>这便标明了以“礼”来治理国家是十分有必要的。所以,简文中“度”与传世文献中“礼”的作用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二者之间具体细微的差别如何,还有待于材料的更新以进一步辨析。

## 2 流动的“士”阶层

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对士阶层的源流及其之后的发展流变作了详细的论述。士阶层是属于上层统治集团的,但属于该集团内部的最末端,其主要职责是负责基层性事件。<sup>⑤</sup>春秋末期,社会的剧烈变动所累计的量

变达到了一定的质变条件,士、庶两个阶层的界限变得模糊,这使得庶人阶层的社会身份有了更多上升的可能性,而原本处于集团末端士阶层的社会身份则有下降的趋势。颜回虽在《论语》中是清贫人物的典型代表,但溯其源流,自其远祖父邾武公为鲁国附庸后,后十四世皆为鲁国卿大夫,这便是一个士阶层社会身份下降较为真实的例子。<sup>⑥</sup>在《管子·小匡》中,记载了“农”这一阶层可上升至士阶层的详细描述:“朴野而不愿,其秀才之能为士者,则足赖也。”<sup>⑦</sup>顾炎武在其《日知录》中还写道了这样一段话:“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其说始于《管子》(原注:《穀梁》成公元年传亦云)。<sup>⑧</sup>三代之时,民之秀者乃收之乡序,升之司徒而谓之士。固千百之中不得一焉。大宰以九职任万民,五曰百工……春秋以后,游士日多。《齐语》言桓公为游士八十人,奉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四方,以号召天下之贤士,而战国之君遂以士为轻重,文者为儒,武者为侠。呜呼!游士兴而先王之法坏矣。”<sup>⑨</sup>通过这段记载,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3点:(1)三代以来农民阶层有上升为士阶层的实例,但其中的比例十分微小;(2)自春秋逐渐开始的社会变化使得部分人口变得流动起来,游士日渐增多;(3)战国时期,儒与侠的分别是十分明显的,士阶层分裂衍化为二者,可以说是“道术为天下裂”的结果,所以先王之法被各家有所选择地传承。人口流动的变化必定会使部分人的社会身份有相应的转化,所以士、庶社会身份界限模糊的现象不足为奇。且在清华简长篇政论文《治政之道》<sup>⑩</sup>中所提出的“君守器,卿大夫守政,士守教,工守巧,贾守鬻聚鬻货,农守稼穡”<sup>⑪</sup>鲜明的社会身份属性界限可以说是一种理想化的社会状态,这也从侧面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当时社会身份界限的模糊。

“古代士阶层‘以道自任’”<sup>⑫</sup>的传统结合《治邦之道》中“唯(虽)贫以(贱),而(信)有道,可以(馭)众、(治)正(政)、临事、侏(长)官”<sup>⑬</sup>这一条,其指称对象十分明显。结合简文的上下文意,

讲的是不因贫穷而丧气,不因富贵而骄矜,其真正的志向在于内心坚守的道义,只有内心守住了道义,那么治理国家的理想是可以实现的。<sup>⑭</sup>这也从侧面体现出彼时士身份的复杂性。结合《邦家处位》中“党贡”的复杂性(“或(信)能攷(考)(守),道(美)甬(用)亚(恶),人而曰善”<sup>⑮</sup>),或许可以勾勒出彼时士阶层的多维形象。在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载中,荀子把士分为“仰禄之士”与“正身之士”两类,“总之,由于所处时势不同,荀子笔下之‘士’其流品已甚杂”<sup>⑯</sup>,这与孔子在《论语》对士的定义相差很大:在《论语·里仁》中便开宗明义的谈到:“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sup>⑰</sup>所以,士阶层的变化可视为一个流动变化的过程,至战国时期,士阶层由“信有道”的单一之士衍化出多种分支。苏秦被任用前后的鲜明对比以及鲁穆公与子思的传奇纠纷等都鲜明的体现了这一点。<sup>⑱</sup>

## 3 士人理想中的“文德教化”

前文已谈到《治邦之道》和《治政之道》应被视为一篇的原因,崇尚文德教化是这篇长篇政论文的一个显著特色。简文首先提到了为上者要以身作表率:“古(故)求善人,必从身(始),诘(其)行,(变)正(其)正(政),则民改(改)。皮(彼)善与不善,几(岂)有亘(恒)種(种)才(哉),唯上之流是从。句(荀)王之繇(训)教(教),卑(譬)之若溪浴(谷)……安(焉)口,事必自智(知)之,则百官敬。”<sup>⑲</sup>具体开看,其意为:如自身的言行举止恰当,那么才能达到“百官敬”的效果,如自身不具备相当的人格魅力,那么求贤也就没有了先决条件。类似的话语在《论语》中有很明显的记载,如“其身正,不令而行;其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其次,此句衔接着求贤才。把真正有贤能的人才比喻为国家的肱骨,这样便可以使得国君“不出门檐,以知四海之外”<sup>⑳</sup>的天下大事。<sup>㉑</sup>总的来看,选贤举能是总方向,但同样需要注意细节是要将这些贤能的人才安置在能够发挥他们作用的位置上,要使他们的能力与所

任职的岗位相符合。具体到《治政之道》的文本中,首先开宗明义地讲述了如果圣贤不被任用上天就会降下灾祸,具体体现便是一年四季被打乱顺序,农民们收成不好,国家会遭受旱灾、水灾自然灾害等等,如果贤能的人才被任用的话,那么四时顺时而转,风调雨顺,土地肥沃等。通过大篇幅的描述使被劝诫者明白任用贤才的重要性。在与被缀合成一篇的《治邦之道》中,文德的记载倾向更是十分明确。简文内容除了之前所涉及到的贤能政治外,《治邦之道》在最后结尾处花了较大篇幅描绘了“远人至,商旅通,民有利”<sup>①</sup>的理想景象,其大致分为五个方面:<sup>①</sup>农业生产方面,让百姓按照时节顺序做相应要做的的事情,不妨碍农业的正常生产;<sup>②</sup>经济政策方面,减低关市税率,让人们买卖自由,拉动经济快速发展;<sup>③</sup>民风民俗方面,让百姓们在举行各种仪式时,内心充满敬意,以便于思想上的安定;<sup>④</sup>基础设施方面,整饬桥梁,修建水库,开发水运等;<sup>⑤</sup>军事方面,不在农时兴起戎事,解决战时的后顾之忧。可以看出,上述的措施与儒家所提倡的“仁政”有多处重合,这也与《天下之道》中的主题十分吻合。措施的施行是为了确保能够获得相应的民心,以得到更多的人口资源,为国家的长远发展积累资本。<sup>[5]</sup>

简文中还举了不修“文德”的反面例子。“或(国)必又(有)丕(其)(器),少(小)大(守)之,则必长以亡(无)割”<sup>②</sup>,一个国家无论其治民的多寡,也无论其领土小大,国家的长治久安关键在于其所守的“道”。书于竹帛时期已经有一些国家背离了其长期坚守的“道”,这在简文中有详细的描述。“今之王公以众正(征)(寡),以(强)政(征)溺(弱),以多威(灭)人之(社)(稷),(削)人之

(封)(疆),(离)人之父子(兄)弟,取丕(其)马牛(货)资以利丕(其)邦国。”<sup>③</sup>书作者同样还写到修于“武德”的国家即使暂时灭亡了别国的社稷,获得了战败国的土地、人民与财物,但这仅仅是暂时的,并非国家的长治久安之道,就好像暂时栖息在树枝上的鸟儿,终究有一天是会飞走的。

#### 4 结束语

综上,在书于竹帛的那段时间,士人理想中的文德教化包含了三个方面:识人的明主,贤才与切实可行的利民措施。

#### 注释:

①黄德宽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玖),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第126页。

②余英时著:《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页。

③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上海:中西书局,2018年,第136页。

④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上海:中西书局,2018年,第128页。

⑤余英时著:《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页。

⑥黄寿祺,张善文撰:《周易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726页。

⑦黄德宽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玖),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第127页。

⑧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5-46页。

⑨谢浩范,朱迎平译注:《管子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54页。

⑩余英时著:《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9页。

⑪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35页。

⑫(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七),清乾隆刻本,第138页。

⑬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

上海:中西书局,2018年,第136页。

⑭黄德宽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玖),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第128-129页。

⑮(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75页。

⑯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7页

⑰此处《治政之道》意为《治邦之道》与原《治政之道》联为一篇。

⑱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上海:中西书局,2018年,第137页。

⑲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37页。

⑳黄德宽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玖),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第128页。

㉑余英时著:《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3页。

㉒黄德宽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玖),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第125页。

㉓李守奎:清华简《治政之道》的治政理念与文本的几个问题.文物,2019(09):44-49+2。

㉔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上海:中西书局,2018年,第137页。

#### 参考文献

[1]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M].上海:中西书局,2018.

[2]余英时著.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3]黄德宽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玖)[M].上海:中西书局,2019.

[4]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58.

[5]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 作者简介:

芦娜(1996--),女,汉族,内蒙古丰镇市人,硕士研究生在读,山东省齐鲁文化研究院,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